

64年前,坐着火车去赶考

讲述人:苗百顺
年龄:83岁
参加高考时间:1958年
单位:原市师范学校

那年,我乘坐火车跑到郑州参加高考。虽然已经过去64年,但高考前后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,恍然如昨。

不知什么是“系”

1939年6月,我出生在河南省荥阳县(今荥阳市)广武镇黑李村。1955年初中毕业后,我考入荥阳高级中学。我不是一个聪明的学生,但很刻苦,学习成绩还不错,尤其是理科成绩。至今我还保留着高中时期的成绩单,六门课最低成绩是84分。高三下半学期分科时,我选择了理科,共有语文、政治、俄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六门课程。

临近高考时,班主任周一平老师问我想报考哪个学校,我说:“俺家经济条件不好,只要上学不掏钱,或者少花钱就行。”

周老师一听,建议我报考北京师范大学,因为“学校管吃住,还不收学费”。接着,周老师又问我想报哪个系,我反问老师:“啥是‘系’呀?我不知道。”周老师告诉我:“我是学物理的,你是我的学生,干脆也上物理系,学物理专业吧。”就这样,周老师替我报了志愿,选了专业。

大学宿舍备考

1958年7月7、8、9日,是我参加高考的日子,考场在郑州原河南省煤炭干部学校。我们学校距离考场20多公里,当年荥阳县到郑州不通汽车,全村都找不来一辆自行车。7月4日,我们学校那届毕业生约300人,一人花3角钱买了一张火车票,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乘火车到郑州参加高考。

当天晚上,我和同学们就住在郑州大学学生宿舍。我记得清清楚楚,8人间的宿舍里仅有几张木板床和一盏电灯。晚上10点熄灯,熄灯前,老师催着大家抓紧时间休息,不能熬夜看

书。睡觉时,床上连一张草席都没有,我带了一条床单,一半铺床,一半盖身上,头枕书本睡觉。炎炎夏日,宿舍里闷热难耐,蚊虫乱飞,只能用书本驱赶。那时,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蚊香、灭蚊药,更没有见过电风扇。

两天后,高考正式开始,老师提醒大家:“答题前,一定先把名字写上,然后审题,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作答……”那时考试两个人一张课桌,坐得很近,考生都很老实,没有抄袭作弊现象,只记得考场内笔尖与纸张摩擦发出的唰唰声。

一天考两门,那三天,我像平常在本校考试一样,不急不躁地完成了自己的高考。

穿着姐姐的裤子去报到

高考结束后,我回到原籍参加生产队劳动,割草、锄地,什么活儿都干。

1958年8月20日前后,我正和大伙一起在村里干活时,一个邮递员带着一查书信来到

黑李村问:“谁叫苗百顺?”大伙指了指我。接着,邮递员把那张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给了我。

村里还有一个李姓同学,与我同时考上了大学本科。当时,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很平静,除了想继续上学,我其他啥想法也没有。村民们对我们考上大学一事也反应平平,大家的想法就是“考上学,你上学,考不上,回家种地”,至于上大学对一个人的未来有什么影响,基本没有什么概念。

上大学前,母亲特意给我做了一套棉衣。我穿着表哥送我的的确良衬衣、姐姐的一条女式裤子,带上行李去北师大报到了。五年的大学生活,树立了我的人生观,那就是“当个好老师,教书育人”。

1963年,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平顶山高中(现市一高)当物理老师。1978年,我被调到原市师范学校继续从教,并从教学岗位一直干到领导岗位,1999年6月光荣退休。(本报记者王辉整理)

家人卖南瓜,凑齐了我的路费

讲述人:马培江
年龄:81岁
参加高考时间:1961年
单位:市二院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今年高考期间,我来到市一中校外,看到家长们站在考场外翘首以盼,不禁想起了我的高考。那是60年前的事了,那些经历让我一生难忘。

学习条件简陋

我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睢县的一个小村子,祖祖辈辈种田为生。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号召人人学文化,做新时代农民。在父母的期盼中,我背起书包走进了村里用茅草房搭起的小学。虽然条件简陋,但我的校园生活很快乐。

三好学生、少先队队长、团支部书记、五好标兵……在睢县二中就读时,我的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前茅。我们的学校位于县城北城墙下。我最喜欢春天跑到高高的城墙上,看墙外碧波荡漾的北湖,看桃花纷纷扬扬飘洒在城墙上,伴随着校园内的读书声,别有一番滋味。

好景不长,1957年7月,连续下了5天5夜大雨,县城地势低,大水很快冲进了县城、冲进了我们的学校。大家什么都顾不上带,纷纷外逃。大水过后,学校一片狼藉,教室也冲塌了。我们搬到了一所小学内,老师就站在大水冲刷后的操场上给大家上课。

学习机会难得,我珍惜每一分每一秒。那时候,我有一个信念,一定要改变贫困的现状,即使需要付出几十倍的努力。

回校路上饿晕

1960年,学校伙食为食堂制,每个月都要交纳粮食兑换成饭票,然后再上交一定的伙食费。交不起粮食就无法吃饭,那时候农村还是按工分分粮,工分少就分不到或者分很少的粮食。

学校规定学生一个月只能回家一次,下午6点放学。那时我家距离学校25公里,每到回家的日子,我都是连夜赶路,要走到天快亮才能到家。顾不上休息,我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地里挖野菜,让母亲做成青菜团子(青菜与高粱面或红薯面混合制成)带到学校充饥。菜团子放久

了上面会长毛,我不舍得扔掉,吃的时候将外边的一层白毛拔掉,再掰成小块,在开水里泡着吃。

实在没吃的,我就到城外挖野菜,回来后开水烫着吃。有一次课间操,我饿极了,就躲在教室的墙角处偷偷吃野菜,没有热水,我就着凉水吃。为了读书,我从来没有抱怨过,也没有缺过一节课。

有一次,回学校的路上,饥寒交迫的我晕倒在路边。不知过了多久,被三个手提瓦罐的男孩叫醒,他们十几岁的样子,对我说:“大哥,你饿了吧?这罐子里是我们讨来的饭菜,你吃点吧。”

交谈中,他们得知我在县城读书,更加热情。三人争相把陶罐放到我手中,让我赶紧吃,说吃饱了就有劲儿读书了。望着他们稚嫩的脸庞,那一刻真是百般滋味涌上心头。

凑齐4元路费

我读高三时,家中二姐和妹妹相继生病,无钱医治,眼睁睁地看着她们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我多次要求辍学。倔强的父亲无论如何也不答应,坚持让我

读书。无奈之下,我只好背着书包去了学校。

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,我不负众望,考入了当时位于郑州西郊的河南医学院。

1961年8月的一天,我还在地里干农活,同村的人跑来喊我,说有我的信件。我飞快跑回村,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我特别开心。

父母虽然不识字,但还是拿着我的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。那时候能考上大学的人“凤毛麟角”。谁家能出个大学生,十里八乡都知道,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。

去郑州需要步行50公里到民权,还要花4元路费。家人挑着南瓜去卖,终于凑齐了我的路费。高考为我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对我来说,高考不是结束,而是人生新的起点。

1961年10月6日,19岁的我背着一床破被子,穿着妈妈做的衣服和鞋子,挎着装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书包,信心满满地走进了医学院大门。1966年7月大学毕业后,我在部队待了20年,后来转业到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,直到退休。

(本报记者燕亚男整理)

高考记忆

征集电话:
4940000
邮箱:
wbrx4940000
@163.com